



1963年，23岁未婚的安妮·埃尔诺发现自己怀孕了。羞耻感袭来，她明白自己的意外怀孕将使她和她的家庭成为社会的失败者，她知道自己不能留下这个孩子。四十年后，埃尔诺写下这个故事，讲述她从未克服的创伤。在当时堕胎属于犯罪的法国，她试图用毛衣针自行解决，但徒劳无功。在恐惧与绝望中，她终于找到一名地下医生，结果最后却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差点丧命。

在《事件》一书中，埃尔诺梳理了她的记忆，清晰准确地挖掘出身为女性的这段特殊经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她“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ISBN 978-7-208-18682-8



9 787208 186828 >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定价：36.00 元

事件

「法」安妮·埃尔诺 著 甘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L'événement Annie Ernau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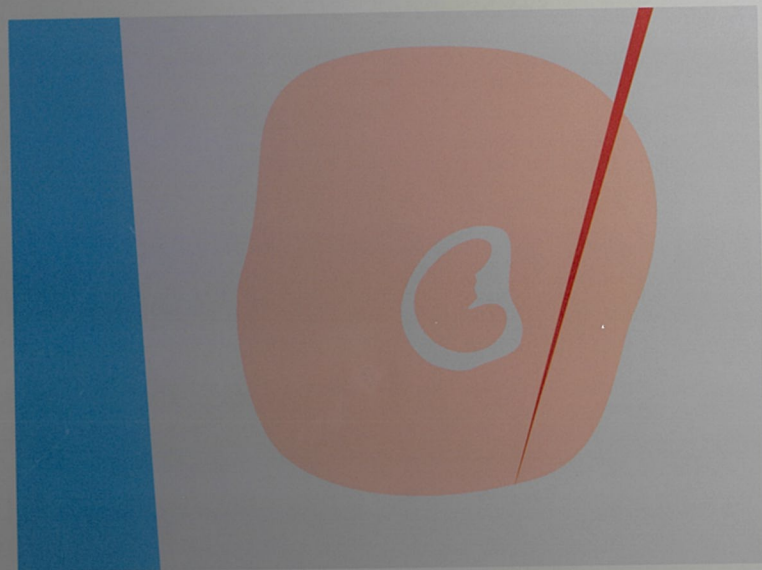
事件

著

「法」安妮·埃尔诺

译

甘露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nie Zraux

L'événement
Annie Ernaux

事件

著

〔法〕安妮·埃尔诺

译

甘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度过青年时代。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曾在安纳西、蓬图瓦兹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教书。她住在瓦兹谷地区的塞尔吉。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简介：

甘露，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学、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主要译著有：《污泥与黄金：波德莱尔》《祖母的故事》等。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
中文版序言

当我二十岁开始写作时，我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改变现实的样貌，剥离其物质层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人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比如，那时我认为我的家庭环境和我父母作为咖啡杂货店店主的职业，以及我所居住的平民街区的生活，都是“低于文学”的。同样，与我的身体和我作为一个女孩的经历（两年前遭受的一次性暴力）有关的一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得到升华，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的。然而，用我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尝试，我失败了，它被出版商拒绝。有时我会想：幸好是这样。因为十年后，我对文学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在这期间，我撞击到了现实。地下堕胎的现实，我负责家务、照顾两个孩子和从事一份教师工作的婚姻生活的现实，学识使

我与之疏远的父亲的突然死亡的现实。我发觉，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第一人称，“我”，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它能够锻造记忆，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没有其他的顾虑。

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望的结果——把个体和私密的东西转化为一种可知可感的实体，可以让他人理解。这些书以不同的形式潜入身体、爱的激情、社会的羞耻、疾病、亲人的死亡这些共同经验中。与此同时，它们寻求改变社会和文化上的等级差异，质疑男性目光对世界的统治。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助于实现我自己对文学的期许：带来更多的认知和更多的自由。

安妮·埃尔诺

2023年2月

目 录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中文版序言	1
事件	1

我的双重愿景：事件得到书写，而书写成为事件。

——米歇尔·莱里斯

谁说记忆不是为了让人看到事情的最深处。

——津岛佑子

我在巴尔贝斯大道地铁站下了车。像上次一样，在高架轨道脚下，男人们三三两两，似乎是在等待什么。路人们拎着塔缇家的桃红色提包，走在人行道上。我走到马真塔大道，认出了那家名叫比利的商店，店的外面悬挂着几件连帽滑雪服。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她穿着黑色的长筒袜，上面粗厚的图案使她的双腿显得格外强壮。直到医院附近，安布鲁瓦兹·帕雷街都几乎空无一人。我穿过伊丽莎楼的拱形走廊。玻璃长廊的庭院中有座音乐凉亭，第一次来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也不知道回去的时候是否还会再经过它。我推开十五号门，又爬了两层楼梯。到了化验室的服务台后，我将标记着自己号码的文件交给了一

一个女人，她在文件夹中翻找，然后找到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装着几张纸。我伸出手，她却并没有给我，而是把档案袋放在桌上，让我找地方坐下，说她待会儿叫我。

等候室被分割为两个相邻的小房间。我选择了离医生诊室大门较近的那一个，那间的人也更多一些。我开始批改之前收上来的作业。在我之后，很快又来了个年轻女孩，她有一头金色的长发，正在将号码交给前台的女人。我留意了一下，确认她也没拿到自己的档案袋，也需等待叫号。在我前面等待着的人们彼此相隔地坐着，其中有个三十多岁、穿着时尚、略微谢顶的男人，有一个戴着随身听的黑人小伙，还有个脸上有疤、深陷在座位里的男人，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继金发女孩之后，又进来一个男人，这已经是等候室里的第四位男性了。他坚定地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书。随后又进来一对情侣，她穿着紧身裤，

腹部隆起，而他则穿着西装系着领带。

桌上没有报纸，只有几张关于摄入奶制品必要性的宣传单，以及“如何与艾滋病共存”的广告页。情侣中的女人正向她的同伴说着什么，她站了起来，双手搂着男人，在他的身上摩挲着。而他一言不发，仿佛静止了一般，双手撑着雨伞。金发女孩双目低垂，几乎要闭上眼，她的皮夹克折叠着搁在膝盖上，整个人看起来愣愣的。在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很大的旅行包，还有一只小的系在它的背面。我心想，她或许比其他人有更多需要担忧的理由，或许是在周末出行前来取检查结果，抑或是要回到外省的父母家。女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是个瘦削的年轻女性，穿着粉色的长裙和黑色的长筒袜，看上去充满活力。她喊了一个号码，无人回应。号码属于隔壁房间的患者，一个男孩很快应声过来，我只看到他戴着眼镜，扎着马尾。

年轻的黑人也被叫到了号码，之后是隔壁房间的人。除了两口子中的女人之外，没人交谈或走动。人们只有当女医生出现在门口或有人出来的时候，才会稍稍抬一下眼睛，用目光追随着她。

电话铃响了好几次，电话那头有的是预约看诊，有的是为了咨询开门时间。有一次，为了回答来电人的问题，服务台的女人去找了化验员。他回答了她，随后重复地说着什么，譬如“没有，她的数值很正常，完全没异常”之类的。他们的谈话在空荡荡的安静中回响。电话那头的人一定是 HIV 阳性。

我批完了手头的作业，同样模糊的场景再一次不断回放。那是七月的周六和周日，关于爱情的冲动，关于射精。正是由于这个场景，这个已经被遗忘的、数月前的场景，我今日才来到这个地方。裸露的身体与缠绕的姿势组合在一起，对我而言仿佛一场死亡的舞蹈。就好像，这个令人厌烦的男人从意大利回来、

使我答应他的邀约，只是为了将艾滋病传染给我。然而，我却无法在那些姿势、肌肤温热的触感、精液，以及今日置身此地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我猜想，在性与其他事物之间，或许从不存在任何关联。

女医生叫了我的号码。还没等我进去，她便向我投来一个大大的微笑。这似乎是个积极的信号。她关上了诊室门，很快对我说道：“是阴性。”我笑出声来。对于之后交谈中她说的话，我毫无兴趣。她的神情愉快而默契。

我全速下了楼梯，毫无旁顾地按原路返回，心想终于得救了。我也很想知道，那个金发女孩是否也一样幸运。在巴尔贝斯车站，人群聚集在站台对面，随处可见塔缇家桃红色提包的影子。

我忽然意识到，1963 年，在拉里伯瓦西埃尔医院等待 N. 医生的诊断结果时，我也曾以同样的方式，

在同样的恐惧与怀疑中，经历过相似的一幕。似乎，在奥吉诺避孕法与贩卖机里 1 法郎的避孕套之间，便是我的人生。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度量人生的方式，甚至比其他所有方式更准确。

1963 年，十月的鲁昂，我的月经已经推迟了一周。这是个阳光明媚而温和的月份。我早早穿上大衣，感觉身体异常沉重和潮湿，尤其是当我在商场闲逛、买长筒袜，并以此打发开学前的日子时。回到埃尔伯维尔大学城的女生宿舍，我再次满怀期待地希望能在内裤上找到一点血迹。每天晚上，我都在记事本上做着记录，用大写字母并在下面画上着重线：什么都没有。夜晚我醒过来，很快便发现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前一年，在同一时间，我开始写一部小说，这一切显得离我那么遥远，就好像永远不会重现。

某天下午，我去影院看一部意大利黑白电影，片

名叫《工作》(*Il posto*)。电影悠长而悲伤，讲述了年轻男孩的第一份工作，以及他的办公室生活。放映厅几乎是空的。我无动于衷地看着小雇员纤弱的身影和他所遭受的屈辱。在影片那让人看不见希望的荒芜中，我知道自己的月经不会再来了。

某个晚上，我被大学城宿舍的几个女孩子带到剧院。她们正好多出一张演出票。剧院里正上演《禁闭》(*Huis clos*)。我还从未看过当代戏剧。台下坐满了人，我离舞台很远，只能看见台上过于耀眼的灯光，心里不停地想着，我的月经还是没有来。现在回忆起来，只能模糊地想起那个一头金发、穿着蓝色长裙的艾斯黛尔，还有个穿着仆人衣服的男孩，他双眼通红，几乎看不见眼皮。我在记事本上写道：“演出好极了。要是在我的肚子里没有这个现实性，那就更好了。”

十月末，我放弃了对月经到来的期待。我预约了一位妇科医生，N. 医生，约定的日期是 11 月 8 日。

诸圣瞻礼节的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回到了父母家中。我有些害怕，怕母亲问我为什么月经会推迟。我确信，每个月自己把脏衣服交给她洗时，她都会格外关注我的内裤。

周一起床时，一阵想呕吐的感觉向我袭来，嘴巴里也浮出某种奇怪的味道。药店的人给我开了瓶消化糖浆，那是种黏稠的绿色液体，喝下去以后，我的反胃更严重了。

大学城宿舍的女孩 O. 提议，让我替她去圣多明尼克学院代授法语课，这是我在奖学金之外额外还能赚到钱的机会。学院的管理人员接待了我，她手里拿着“本拉加尔德和米肖系列”的十六世纪文学教材。

我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教过课，感觉有点害怕。她说这很正常，她自己也是整整两年都不敢抬起头走进哲学教室，每次进去时，眼睛都要死死盯住地面。此刻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向我模仿着记忆里的场景。我只注意到她头顶包裹的纱巾。我接过她借给我的课本，正准备离开时，被一群二年级学生淹没了，女孩们的目光围绕着我，让我涌起一股想要呕吐的感觉。翌日，我打电话给那位女士，拒绝了这份工作。她的语气淡淡的，提醒我把课本还回去。

11月8日，星期五，我正往市政厅广场走，打算乘车前往N.医生在拉法耶特街的诊所，并在路上遇到了雅克·S.。他是文学院的学生，父亲是本地一家工厂的主管。他问我来左岸做什么，我告诉他自已胃不舒服，想要去看腔内科医生。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腔内科并不是治疗胃病的，而是治疗口腔感染的地方。这真是个愚蠢的错误。我害怕他因此产生怀

疑，又怕他提议陪我走到诊所门口，便在汽车到站时慌乱离开了。

从操作台下来后，宽大的绿色罩衫又重新落回我的大腿边缘，妇科医生告诉我，说我肯定是怀孕了。我之前认为的胃部不适，实际上是孕吐的一种表现。他还给我开了些催经的注射剂，但似乎并不认为它们会起什么效果。走到门边时，他愉快地向我微笑，对我说，“因为爱情而到来的孩子总是长得格外漂亮”。这句话让我感到害怕。

我步行回到大学城的宿舍。在记事本上留下今天的记录：“我怀孕了。太可怕了。”

十月初的时候，我与P.睡了几次。他是政治学院的学生，我在假期时与他相遇，后来又去波尔多见了他。根据奥吉诺避孕日历，我知道自己正在危险期，但我不信那个东西真能在我的腹中“生根”。在

爱与愉悦中，我自认为自己的身体与男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在波尔多的一幕幕——从巴斯德街的房间外汽车无休止的噪声、拥挤的床、蒙田露台，到放映过历史片《掠夺萨宾妇女》的电影院——所有这些，现在都只剩下一种意义：我曾经身处那里，以及彼时的我对自己将会怀孕一事茫然无知。

晚上，学生事务服务中心的护士帮我注射了一针，她并没有多说什么。次日清晨也同样如此。那是11月11日的周末，我回到父母家，下身一度急促而短暂地流出一点淡红的血迹。我将沾了血渍的内衣和长裤搭在脏衣服上，使它们看起来十分显眼。（我在记事本上写道：“没有后续的流血。还能用什么来瞒过母亲。”）回到鲁昂后，我给N.医生打去电话，他确认了我的状况，说要给我寄一份怀孕证明。第二天，我便收到了

这份文件。妊娠证明：安妮·杜切斯内小姐，预计分娩日期：1964年7月8日。我仿佛看到了夏天，看到了刺目的日光。随后，我撕掉了那张纸。

我写信给P，告知他我怀孕的消息，并告诉他我并不想将它留下。我们已经分开，对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但我很乐意给他无忧无虑的生活带来一丝动荡，尽管我并不知道的是，告诉他这个终止妊娠的决定，将会让他如释重负。

一周之后，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新闻也不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之后的数月都氤氲在一种模糊的幽晦之中。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街巷中游走，日复一日。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脑海中总有一些文学化的表达，譬如

“漫漫远航”，或是“善与恶的彼岸”，又或是“茫茫黑夜漫游”。在我看来，这些都通向了我的经历与体验，并带着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味和美感。

数年来，我的人生在这个事件的周围徘徊兜转。每次读到小说中关于流产的段落，我都会陷入莫名的战栗，它没有模样，也没有思维，只有每个字都在不断唤起的汹涌的感官震颤。同样地，每当无意中听到《爪哇女人》(*La Javanaise*)或《我的记忆在褪色》(*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的旋律，或是其他陪我度过那段时期的歌曲时，我都感到深深的绝望。

一周前，我开始写这个故事，全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它，而仅仅是出自某种记录与书写的欲望。每当我想继续两年前开始的写作时，这种欲望便会不断穿透我的全身。我无能为力，无法停止去想它。将自己沉浸在这个事件中，这个想法令我惶恐，

但我依旧告诉自己，除此之外，或许直到死亡到来，我都无法为这个事件做些什么。如果有什么算是遗憾的话，那便是它了。某个夜晚，我梦见双手捧着自己写的关于那段堕胎经历的书，但图书馆里到处都找不到这本书。在任何书目里，它仿佛都从未存在。在封面的底部，有几个粗体的大字：精疲力竭。彼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梦境究竟意味着我应当写下这本书，还是想告诉我，这样做也只是徒劳。

随着这个故事的书写，时间开始向前，并拖着我一起向前。现在我知道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到底，不管将发生什么，都要像二十三岁时将妊娠证明撕掉的那一刻一样，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我想要重新将自己浸没在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已然知晓会在那里发现什么。这一探索被刻进了故事的情节里，还原了那个既在我之中、也在我之外的时间

里所发生的事件。日程本和日记里曾经那几个月的记录仿佛一个个坐标，是事件还原过程中的必要证明。我强迫自己沉浸其中，顺着一个个画面走下来，直到感受到身体的“连结”，直到有词语冒出来，告诉我，“就是它们了”。重新听到那些字句、那些在我身上无法被抹去的言语，让我感到它们的意义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又或是无比使人安慰，以至于当我今天再想到它们时，每每被恶心或温柔的感觉所淹没。

我所经历的这场——秘密的——堕胎体验，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故事，但这种完成性并不足以说服我将它尘封，尽管正义的悖论几乎总会以“事情总归是结束了”来迫使受害者闭嘴，以至于同样的沉默常常将已发生的事情掩盖。如今没有任何禁令能够对堕胎施压，正因为如此，我才能避开七十年代斗争的集体意义和不可避免的简化口号——“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直面这一无法忘却的事件的现实性。

医生如有以下行为，将面临监禁或罚款：1. 在任何情况下实施终止妊娠行为；2. 医生、助产士、药剂师等对此行为进行指导或提供帮助；3. 女性自行停止妊娠或同意终止妊娠；4. 怂恿终止妊娠或宣传避孕。除此之外，可在此基础上进行附加处罚，不限于在第二条的基础上暂时或永久性剥夺当事人的执业资格。

《新拉鲁斯百科词典》1948年版

时间不再是一串平淡而连续的日子，充斥着课业、各种报告，以及在咖啡馆和图书馆停留的时光，或是随之而来的考试与暑假。时间变成了在我体内不断变化的某物，是我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的东西。

我继续去上文学和社会学的课，去学生餐厅，在中午和晚上的时候去面向学生开放的法鲁士酒吧喝咖啡。然而我却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里的女孩们肚子扁平，而我与她们不同。

在思考自身处境的时候，我并没有使用任何意义明晰的表述，既不想用“我将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句子，也不想提“怀孕”，更不愿使用“妊娠”这个听

起来无比“怪诞”的词语。这些表达似乎暗含了一种对未来的接受，而这种未来或许并不会到来。没有必要去为某个我已决定使之消失的东西命名。在日程本上，我常用的词是“它”、“这件事”，仅有一次用了“怀孕”这个表达。

对于它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我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后来的确认，相信它命中注定会落在我身上。从我十四岁第一次的独自欢愉开始，它便在暗中窥伺着。尽管我向圣母和其他女性圣人祈祷，却都无法将这种经验抹去。我固执地将自己幻想成一个妓女。似乎，它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发生，都是一种神迹。直到上个夏天，我才冒着被羞辱、被作为妓女和娼妇对待的代价，成功地在做爱时中途停止。最终，我不得不屈服于欲望的暴力，这种欲望无法适应调情的边界，让我甚至对普通的亲吻也充满了担心。

模模糊糊地，我在所出身的社会阶级与之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事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作为工人

和小商人家庭里第一个进入高等学府的人，我逃脱了工厂与柜台的宿命。但无论是高中结业会考，还是文学的大学文凭，都无法扭转贫穷的传递。一个怀孕的女孩，就像酗酒者一样，是这种贫穷的标志。我被某种东西拉扯住，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社会意义上的失败。

堕胎的念头并未使我感到一丝恐惧。对我而言，这件事看上去十分简单，或者至少是可行的，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它只是一场普通的考验。而我只需走上那条许多女性在我之前就已经走过的道路。从青少年时代起，我便听到过许多故事，或者在小说中读到，或者来自街头巷尾那些压低了声音的流言蜚语。我获得了某种模糊的知识，比如可以用织毛线的针和欧芹的尾部，或是通过灌肥皂水、骑马的方式，而最有效的便是找到一位“没有营业执照”的医生，或是某个被冠以“天使妈妈”这一美好称呼的年轻女

性——两者的费用都十分昂贵，但我对价格的事一无所知。在前一年，某位离了婚的女性跟我说，斯特拉斯堡的医生帮她堕掉了孩子，但并没有透露细节，只是说：“真的太痛了，我的双手几乎紧紧嵌进了洗手池里。”我也准备好紧紧抓住洗手池。我努力不去想自己可能会因此死掉。

撕毁妊娠证明的三天后，我在校园里遇到了同学让·T.，他已经结婚，还领着一份薪水。两年前，我在一门关于维克多·雨果的课上和他一组。他激昂的话语和革命性的观念十分对我的胃口，我们也曾经去站前广场喝一杯。在某个时机，我委婉地向他透露了自己怀孕的事情，或许是因为我觉得他能够提供某些帮助。我知道他参加了某个半地下的、支持避孕自由的组织，即所谓的“家庭计划”(Planning familial)，我想自己或许可以向他们求助。

他随即露出好奇和玩味的神情，似乎是看到了我

张开的双腿，以及献出生殖器的样子。又或许，他在我从好学生向陷入绝境的女孩的转变中，获得了某种愉悦。他想知道我因谁怀孕，从什么时候怀的孕。他是第一个我与之谈论这个情况的人。尽管彼时他没能向我提供什么解决方案，但他的好奇对我而言却是一种保护。他提议带我去他位于鲁昂郊区的家里吃个晚饭。而我也不想独自回到大学城的宿舍。

当我们到达时，他的妻子正在给孩子喂饭，孩子被安置在高高的椅子上。让·T. 简短地告诉她，说我遇到了一些麻烦。之后又来了一位朋友。待孩子睡觉后，她为我们准备了兔肉和菠菜，肉片下的绿色让我的心脏有些难受。要是我不去堕胎的话，明年我的生活也会像让的妻子一样。晚饭后，她与那位朋友一同离开，去拿明天学校要用的材料——她是一名小学教师——，而我则与让·T. 一起洗碗。他用双臂将我环绕着，告诉我，还有时间可以做爱。我从他的怀里抽

身出来，继续洗碗。孩子在隔壁的房间哭泣，我有种想要呕吐的感觉。让·T一边擦拭碗盘，一边从后面压到我的身上。突然，他恢复了平日的神情，装作刚刚只是为了试探我。他的妻子回来了，他们建议我留下来过夜。天色已经很晚，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车将我送回去。我睡在了客厅的一张充气床垫上。次日清晨，我回到了大学城的宿舍，这个我昨天下午早早离开的地方。床铺没有整理，一切都还是我离开前的样子，而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溜走了。正是通过这样的细节，人们可以感知到自己人生混乱的开始。

那时的我并不觉得让·T对我有任何轻视。对他而言，我只是从不清楚是否可以一起睡觉的那类女生，变成了不容置疑的、已经同别人睡过的那一类。在那个时代，这两类人的区别泾渭分明，并决定了男孩对女孩的态度，而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况且他还可以确保不会让我怀孕，毕竟我现在已

经怀上了。这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插曲，但鉴于我当下的处境，却总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向我保证会帮我找到医生的地址，我也并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

两天后，我又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他带我去河畔的一家餐馆吃饭。餐馆位于汽车站附近，在一个被战争摧毁后用混凝土重建起来的街区，我从未去过那里。离开了学生们的世界，我开始闲逛，按照惯例，这个时候我应该同他们一起学习或者做其他事情。他点了些三明治，依旧保持着他的吸引力。他笑着对我说，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给我放根探针。我不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他随后向我提到了B.夫妇，谈到B.的妻子曾在两年或三年前做过一次堕胎手术。“她还差点死在这上面。”他没有这对夫妇的地址，但我去联系L.B.做记者的报社。我见过她，同她一起上过语文学的课，她是个瘦小的女孩，有一头棕褐色的头发，眼镜片厚厚的，表情严肃。做课堂报告

时，她得到了老师慷慨的颂扬。像她这样的女孩也曾堕过胎，这使我放下心来。

让·T.吃完了他的三明治，瘫在椅子上，笑的时候露出了缝隙很大的牙齿。“吃点东西总是好的。”他说。我的胸口一阵难受，孤独的感觉袭来。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过多地牵扯到这件事中。在他所属的组织“家庭计划”看来，想要堕胎的女孩们并不能进入他们所制定的道德框架。他想要的是知晓我的最新动态，知道我的故事的后续。这是一件他既可以什么都能看到，又什么都不用埋单的事情。他提醒我，作为支持主动生育意愿的组织成员，他在“道德上”无法借钱给我以便我去秘密堕胎。（在日程本上，我写道：“与T.先生在河畔吃饭。问题不断堆积。”）

我开始主动寻找。需要先找到L.B.。我曾经常看到她的丈夫来餐厅散发宣传册，但他似乎不再来了。中午和晚上的时候，我穿过一间间教室，长久地伫立

在门前的大厅里。

之后的两个晚上，我在《巴黎-诺曼底》报社等待L.B.。我不敢进去，不敢去询问她是否已经到了。我害怕人们会觉得我形迹可疑，更不想去她工作的地方打扰，为了这样一件她差点因此死掉的事情。到了第二个晚上，天下起雨来，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躲在伞下，机械地翻阅着钉在护板上的报纸，而护板则被用铁丝固定在墙上。我交替地看着医院路的两端。L.B.就在鲁昂的某个地方，她是唯一可以救我的人，可是她没来。回到大学城，我在日程本上写道：“依旧是在雨中等L.B.。她没来。我失去了所有希望。这件事需要结束。”

我无计可施，无路可走。

尽管很多小说都谈到过堕胎，却从未提到过实施

的细节，更没有告诉读者，它究竟如何发生。在女孩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刻与她卸下负担之间，一切都被省略了。我在图书馆寻找带“堕胎”字样的资料，相关的只有某些医学杂志。我取出两本，一本《外科医学档案》，还有一本《免疫学杂志》。我期望能够找到一些实用指南，但所有的文章都只在谈论“堕胎犯罪”的后果，而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在我这个时期的地址簿扉页上，写着诸如 *Perm 484*、*n^{os} 5 et 6* 以及 *Norm. Mm 1065* 等名称或编号。我看着这些用蓝色水笔写下的潦草字迹，感到既陌生又着迷，仿佛这些物质性的证据，以隐晦不明和不可消除的方式蕴含了一种现实性，无论是记忆还是写作，因其不稳定性，都不能使我达到这种现实性。）

一天午后，我离开了大学城，打定主意找一位愿

意为我堕胎的医生。在某个地方，总会有这样一位医生。鲁昂已经是一座灰色石头的森林。我仔细观察着金色的指示牌，思考着我可以在牌照背后找到谁。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去敲响门铃。我在等待一个征兆。

我往马坦维尔街区的方向走去，想象着在这个贫穷的街区，这个市郊的地方，医生们或许更能够理解我的处境。

十一月的太阳显得苍白。我一边走，脑中一边回响着那首到处都能听到的歌曲的旋律，《多米尼克，尼克，尼克》（*Dominique nique nique*），这是首由多米尼克修会的一位“微笑修女”伴着吉他演唱的歌曲。歌词给人以教化且有着纯真的气质——“微笑修女”不知道“*nique*”有“做爱”这层意思——，歌曲旋律仍是欢快而富有节奏的。这给了我继续寻找的勇气。我来到圣马可广场，集市上的店铺鳞次栉比，尽头处是弗罗热家具店。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和母亲一同来过这里，我们买了一个衣橱。此刻我已经不

再看门上的牌照，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十多年前，从《世界报》上，我得知了“微笑修女”自杀的消息。报纸说，在《多米尼克，尼克，尼克》这首歌获得空前成功后，她在修会中遭受到许多挫折并最终离开，与一名女性生活在一起。后来她不再唱歌，也渐渐被人遗忘。她开始喝酒。这篇文章使我的内心震荡不已。上面写的女人仿佛是一个与社会决裂的人，是一个或多或少有着同性恋倾向的还俗者，一个酗酒者，一个她并不知道自己在某天将会成为当我独自在马坦维尔街区迷失时，给予我陪伴的人。与时代的脱节和精神上的被遗弃感让我们彼此靠近。在那个午后，支撑我活下去的勇气便来自这样一首歌，一首由后来迷失自我甚至因此死去的女人所演唱的歌。我怀着强烈的希望，希望她也能够获得一点幸福，在那些被威士忌填满的夜晚，她能够懂得“nique”的意思，想到她的修女姐妹，希望她最终能

与她们好好地做爱。

“微笑修女”就跟所有这些女人一样，所有我未曾遇见的女性，她们活着或死去，真实或虚幻，尽管我与她们有着诸多不同，但我却感受到某种共同的东西。她们是我身上一根看不见的链条，连结了女艺术家、女作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以及我童年中的女性们。这给了我一种印象，即我的故事就在她们之中。）

和大多数诊所一样，在六十年代，博瓦桑广场的旁边，位于伊瑟尔大道的全科医生的诊室看上去就像资产阶级家庭的会客厅，里面有地毯，有带着玻璃窗的书柜，还有时髦的办公桌。很难说清楚我为什么不得已选择了这个漂亮的街区，右派议员安德烈·玛丽便住在这里。天色已经渐晚，或许我只是不想什么都没做便这么回去。有位年长的医生接待了我。我告诉他，自己感到疲倦，而且我的月经已经很久没来

了。他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为我听诊，宣布我的确是怀孕了。我没敢让他为我终止妊娠，只是请求他让我的月经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行。他没有回答，也没有看我，而是习惯性地抨击起那些对女孩们始乱终弃的男人们。他给我开了一个含钙的安瓿和一些雌二醇注射剂。知道我是大学生后，他平静了下来，问我是否认识他某位朋友的儿子，菲利普·D.。我确实认识他，他有着棕褐色的头发，还戴着一副眼镜，带着老式天主教徒的派头，入学第一年时我和他同上一门拉丁语课，之后他便去了卡昂。我记得自己曾经还想过，觉得他完全不是能让我想要怀孕的类型。“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不是吗？”医生微笑着说，很高兴能得到我的认同。他已经忘记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当他陪我走到门口时，显得长舒一口气。他没有叫我再来。

像我一样的女孩们浪费着医生的时间。没有钱、

没有关系——否则她们也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最终还以失败告终——，她们使医生们不得不搬出法律，告诉她们法律禁止任何类似的事情，而自己会因此锒铛入狱。他们不敢说出真相，他们不愿意为了女孩们那双美丽的眼睛赌上自己的全部，更何况这些女孩还能蠢到让自己的肚子被搞大。除非他们真的宁愿自己去死，也不去触犯一条让女人们去死的法律。但是所有人都该想到，即使法律禁止她们堕胎，她们也总会找到解决办法。面对职业生涯被断送的风险，一根插进阴道的毛衣针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我努力从鲁昂圣马可广场冬日的阳光，从“微笑修女”的歌曲，甚至从伊瑟尔大道铺了毡子的医生诊室中走出来——我已经不记得医生的名字。为了逃脱图像的束缚，为了抓住那看不见的、抽象的、在记忆中缺席的现实，但现实将我放逐到街巷之中，去寻找一名不太可能存在的医生：法律。

法律无处不在。在我的日程本所使用婉转法和间接肯定法的修辞表达里，在让·T. 凸起的眼睛里，在强迫完成的婚姻里，在《瑟堡的雨伞》(*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里，在堕胎者的耻辱和其他人的斥责里，在对未来某天女人可以自由决定终止妊娠的苍白而无力的想象里。很久以来，堕胎被禁止，是因为它是一种罪恶，还是因为堕胎被禁止，所以它成了一种罪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它的答案。人们依据法律做出评判，人们却并未评判法律。

我不相信医生开的注射剂真的能够起效，但我什么都愿意尝试。由于害怕学生事务服务中心的护士会产生怀疑，我请了一位学医的女学生帮忙。我那时常在餐厅看到她。晚上的时候，她让另外一个女生到我的房间帮我，那是个金色头发、毫不拘束的漂亮女孩。见到她时，我感到自己正在变成那种可怜的女生。她给我进行了注射，什么也没多问。第二天，由

于两个女生都没有空，我便自己坐在床上，闭着眼睛将药剂推进大腿里。(我在日程本上写道：“两针下去了，一点效果都没有。”)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伊瑟尔大道的医生给我开的，是防止流产的药。

(我感觉自己被这个故事拖拽着，不知不觉间，它带给我一种事情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不幸的感受。我强迫自己控制住想要将那段日子囫圇略过的欲望，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将它们保存下来——包括对细节的追寻和记录，对未完成过去式的运用，以及对事实的分析——时间缓慢而无休止，在停驻中累积着它的厚度，仿佛一层又一层的梦。)

我依旧去上课，去图书馆。夏天的时候，我满怀热情地选择超现实主义中的女性作为我的论文主题。然而如今，它同古法语中的语法搭配或是夏多布里昂作品的隐喻一样，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无动

于衷地阅读着艾吕雅、布勒东、阿拉贡的文字，赞扬那些抽象的女性形象、那些作为人与宇宙间调停者的女性，记下那些四散的、与我的论文主题相符合的句子。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之前摘录下来的段落，对教授要求的大纲和第一章的内容也感到无能为力。将材料相互关联并融入有逻辑的论述中，这项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

自中学以来，我便对各种概念的运用得心应手。写文章与其他学术工作让我体会到一丝骄傲，并将对它们的熟稔视作“沉进书本里”的代价——就像是我的父母所说的，我的未来被交给了它们。

如今，“概念的天堂”变得遥不可及，我在尘世步履维艰，身体陷入恶心之中。我时而希望解决身上的问题，以便重新掌握思考的能力；时而又会觉得，自己获得的知识就像豆腐渣工程，已然永久地坍塌了。在某种意义上，我在论文上的无能甚至比堕胎的急迫需求更令我感到惊恐。它不容置疑地彰显着我身上某

种无形的衰退。（在我的日程本上，我写道：“我写不出来了，我无法再继续下去。怎样才能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我不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这种感受是不是普遍存在。它给我带来了某种难以描述的痛苦。

（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感觉，似乎我无法深入地探索事物，仿佛自己被某种旧物拉扯着，它将我与手工劳动者的世界联系起来——而我正是来自这个惧怕繁重“脑力劳动”的世界，又或是将我与我的身体、与身体中那个纪念品相连结。）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都以为恶心的感觉已经消失，但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会感到它正汇聚成隐秘的潮汐，随时准备向我袭来。对食物的欲望与排斥没有一刻放过我。某日路过猪肉食品店时，我看到了一些粗香肠。我进去买了一根，随即在人行道上狼吞

虎咽起来。还有一次，我恳求某个男孩把他的葡萄汁让给我，我实在太想喝了，仿佛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对于一些食物，我只要一看到它们就会异常反感，而另一些则让我看着心情愉快，它们在我的口腔中分解，揭示着未来的腐化。

某天清晨，我和其他学生一起等待讲课结束，以便进入教室。学生们的身影像一个个光点，他们迅速找到了位置。而我只得坐在台阶上。

我在日程本上写道：“持续不断的不适。”——“十一点，在B.M.（市立图书馆）感到一阵恶心。”——“我依旧病着。”

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有些男孩会让我想入非非，他们对此并不知情。我追踪他们，在阶梯教室的时候坐在他们不远处，注意着他们去餐厅、图书馆的时间。这些想象的浪漫情景似乎已经离我很远，变得有些虚幻，几乎是属于一个小女孩时期的事情。

在拍摄于上一个九月的照片里，我坐着，深棕色的头发落在肩膀上，流苏长袖衬衫的领口处披了一条围巾，微笑且反叛。每一次当我看着照片里的人时，我都在想，这是我最后一张作为小女孩的照片了，她在一种看不见的、永恒存在的时序里，被诱惑裹挟向前。

在法鲁士酒吧的晚会上，我遇到了大学城的女孩们。在那里，我感到某种对男孩子的欲望，想要找到一个金发温柔的男孩，想和他不停地跳舞。这种感受是我知道自己怀孕以来的第一次。没什么能够阻止性器官的收紧与开启，那个已经存在的胚胎也不会抱怨新涌入的陌生精子。在日程本上我写道：“和一个浪漫的男孩跳舞，但我什么都做不了。”

所有的话语在我看来都充满了稚气且无关紧要，一些女孩习惯讲述她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也让我难以忍受。一天早晨，在图书馆，某个来自蒙彼利埃的女孩坐在了我的旁边，我和她选了同一门语文学课程。她详细地向我描绘了自己位于圣摩尔街的新公寓、她的房东、晾在玄关处的织物，以及她在博瓦桑一所私人机构的教学工作，诸如此类。这种细致的描述和满意的神色在我看来既疯癫又下流。我似乎记住了那天她跟我说过的所有事情，以及她的南方口音，或许是因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所以对我而言透露出某种令人害怕的意义，提醒着我被正常社会驱逐的事实。

（自从我开始书写这个事件，我尝试尽可能地回忆起生活于其中的同学们的面孔和名字，除了其中的两三个人，次年我离开鲁昂后便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从遗忘中释放出来，自发地回到那些我曾经日常邂逅他们的地方，文学院、学生餐厅、法鲁士酒吧、市立图书馆，还有他们在周五晚上聚集的、等候回家火车的站台。这群人在我的记忆中复苏了，而我被浸没在他们之中。正是这群人，而非我的私人记忆，让我重新回到二十三岁的时候——让我理解彼时的自己是如何被校园环境所淹没。这些名字、这些面孔，它们为我的慌乱指明了缘由：因为与他们相比，与这个作为参照的世界相比，在内心里，我已经变成了一名罪犯。

我不允许自己在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并非一些虚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着的人。然而，我却无法想象他们如今正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我或许是对的：现在的他们——无论是身体、思想、他们的银行账户——都与六十年代的他们、与我在写作中看到的他们毫无关系。当我萌生

了想在公共信息网络终端的电话簿上寻找他们的念头时，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周六，我回到了父母家。掩盖现在的情况对我而言并非难事，这种遮掩自青春期以来便是我们关系中的常态。我的母亲属于战前的一代，是有原罪感与性羞耻的一代。我确信她的信仰不可被触碰。他们努力说服自己，认为我也有同样的信仰，而我也同样努力忍受着一切。就像大多数家长一样，他们自以为能毫无错漏地觉察到孩子任何偏航的迹象。为了让他们安心，只需有规律地去看望他们，脸上挂着平和的微笑，带来脏的衣物，再带走一些日常要用的东西。

周一，我从父母家带回来一副毛衣针，它们是我在某个夏天买的，那时我想给自己织一件上衣，但一直都没有完工。织针格外粗，表面泛着电镀蓝色。我没找到别的解决办法。我决定自己动手。

前天晚上，我和大学城的几个女孩一起去看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我的内心陷入极大的动荡之中，止不住想着第二天要做的事。透过电影，我知道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我所要遭受的痛苦与灭绝集中营的人所经历的苦难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从中汲取了勇气，重新坚定起来。知道我准备做的事情是无数人已经做过的，这一点也给了我一些支撑。

次日清晨，我躺在床上，小心地将毛衣针伸进我的性器官中。我反复摸索，却还是没找到子宫的入口，在感到痛苦时，忍不住停下了动作。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单独完成这件事。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绝望。我做不到。“一场空。根本不可能。我哭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这样的叙述或许会引起不适，甚至是厌恶，被

贴上品位低劣的标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无论事情本身如何，都赋予了人不受时效限制的书写的权利。真相不分贵贱。如果我没有达到体验的最深处，我便使女性的现实处境继续被隐匿在黑暗之中，我便让自己站在了统治世界的男性一边。)

经过了徒劳的尝试后，我拨通了 N. 医生的电话，告诉他我不想“把它留下”，告诉他我已经饱受摧残。这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我想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他让我马上去他的诊室。我想他应该是要做些什么了。他冷静地接待了我，神情严峻。检查后，他告诉我一切都很稳定。我哭了起来。他精疲力竭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垂着头，神情显得有些烦躁。我想，他的内心仍在斗争，但他很快便会屈服的。他抬起了头：“我不想知道您接下来要怎么做。但您需要一些盘尼西林，在那之前和之后的八天服用。我帮您开处方。”

从诊室出来，我责备自己错失了最后一次机会。我并不擅长钻法律的空子。其实，只需再多一些眼泪和哀求，再多展现一下我的慌乱，他就会知道我的堕胎意愿有多么强烈。(我一直以来都这么想。但或许是我想错了。这些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至少，他并不希望我因为败血症而死去。

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愿意说出堕胎这个词，一次也没有。这是一个在语言中没有位置的东西。

(前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回到了 1963 年，那时的我正在寻找堕胎的方法。醒来后，我感到刚刚的梦——准确无误地——将我放回到曾经淹没了我的重负和无力感中。我正在写作的书对我而言正像是一次绝望的尝试。就像在转瞬即逝的高潮来临时，人们会感到“这就足够了”，我试图通过文字重新找回的东西，在梦的回忆中不费吹灰之力地出现了——这使我

的写作行为失去了必要性。

但在此刻，在我所体验的、唤醒我的战栗消失的时候，写作重新找回了它的必要性，比梦境的呈现更加强烈的必要性。)

回到大学，被我视作朋友的两个女孩已经不在那里了。她们其中一个在圣伊莱尔杜图韦（Saint-Hilaire du Touvet）的学生疗养院，另一个正在巴黎准备心理师文凭考试。我给她们写信，告知她们我怀孕的消息，以及我打算堕胎的想法，她们并未评判这件事，但看起来吓得不轻。我并不需要别人的害怕。她们也无法为我做些什么。

我在入学的第一年便认识了 O.，她的房间和我的在同一层，我们经常一起出去，但我并未把她纳入朋友的范围。女孩之间的关系常常备受诽谤，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她们，也没有使她们的关系恶化，而彼

时的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觉得她既令人厌烦又黏人。我知道她总渴望打探别人的秘密，把它放进自己的宝库，再拿出来献给其他人，让别人在某一时刻觉得她还有一点意思，从而使她显得不那么烦人。总而言之，这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这个遵从教皇关于避孕的教谕的女孩，她本应该是最不会信赖的人。然而，最终却正是她成了我十二月那一整个月的密友。原因或许在于：我想要倾诉自身境况的欲望远远超过了对倾诉之人所产生想法或评判的担忧。我陷入无能为力之中，只想到倾诉这样一个动作，至于结果什么的，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了。因此，我试图找一个在现实中看来不可思议的倾诉对象。

同样地，我还差点认识了安德烈·X.。他是文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擅长用冷峻的语调讲述《切腹》（*Hara-Kiri*）里的恐怖故事。在咖啡厅的一次聊天中，我告诉了他自己怀孕的事情，还跟他说，自己不惜一

切也要终止妊娠。他十分错愕，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接着他试图劝我遵循“自然法则”，不要去做这件对他而言是犯罪的事情。我们一起在“大都会”的桌边坐了很久，桌子靠着临街的大门。他没办法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在他坚持让我打消堕胎念头的背后，我觉察到一股浓烈的惶恐、一种惊慌的错愕。我堕胎的意愿在他那里激起了某种诱惑力。在内心深处，对于O、安德烈和让·T而言，我的堕胎是一个他们看不透结局的故事。

（写到这里我犹豫了：我重新回到“大都会”，看到了那张我们曾经坐过的小小桌子，就在通往维尔特街的门边。还有那个叫儒勒的侍应生，他的脸上仿佛没有表情，我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存在与虚无》中的人物，但后者并不是侍应生，只是在扮演一个咖啡厅侍应生的角色，诸如此类。通过想象去观看或是通过记忆去重现，这是属于写作的任务。但“我的重

见”能够记录这个进入另一种人生的感觉，尽管它已经过去，已经被遗失。在这种感觉下，“仿佛我还在那里”的表述是如此及时，如此精准。）

唯一显得对此事没什么兴趣的，就是那个使我怀孕的人。我陆续收到几封从波尔多寄来的信，信里暗暗表示了事情的棘手之处。（我在日程本写道：“他要我自己想办法。”）我本该就此知道，他对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他只有一个想法，即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中，他还是那个只需要关心考试和未来的普通学生。尽管我早该预感到这一切，却仍没能与他决裂，在绝望地寻求堕胎方法的同时，分离的空虚于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我谨慎地隐藏了真相。每每看到咖啡馆里男孩子们开着玩笑、放声大笑的时候，我总备受蹂躏——此时他或许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我从中找到了扰乱他宁静的理由。十月时，我们本来准备到下雪的地方共度圣诞，与一对情侣同行。我并

不打算改变这个计划。

时间来到了十二月中旬。

我的屁股和胸把连衣裙撑得很紧，我变得笨重，但恶心的感觉消失了。我有时会忘记自己已经怀孕两个月。或许是因为未来变得遥远而模糊，对日期的焦虑也变得麻木起来。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时间从女孩们的身边溜走，但最终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躺在床上，冬日的阳光洒满整扇窗玻璃。我听着《勃兰登堡协奏曲》，简直就和去年时一模一样。我似乎觉得，生活一点儿也没变。

在日记中，我写道：“怀孕对我而言好像一种抽象的概念。”——“我摸向肚子，就在那里了。没有什么更多的想象。如果我置之不理，到七月，就会有一个孩子从里面出来。但我现在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圣诞节前的十来天，当我不再数着日子的时候，L.B. 敲响了我房间的门。让·T. 在街上遇到了她，并告诉她我很想见到她。她仍旧戴着那副黑色框架的厚眼镜，看上去有些唬人。她对着我微笑，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她给了我某位 P-R. 女士的地址，她曾和她打过交道。这女人是个上了年纪的护工，在巴黎第十七区卡尔蒂内街那条死胡同里的一家诊所工作。听到“死胡同”这个词时我一定是笑了，这个词给“天使妈妈”们的形象增添了些许浪漫而又肮脏的意味。她还告诉我，卡尔蒂内的那条死胡同就在宽阔的卡尔蒂内街尽头。我对巴黎并不了解，这条街道的名字只让我想到一家名叫“卡尔蒂内定制”的珠宝店，电台里整日都播放它的广告。L.B. 淡定从容，甚至有些活泼地跟我讲述 P-R. 女士的做事方式：她先会用窥镜将探头送进宫颈，之后就可以等待流产了。她是位严肃而干净的女性，会用沸水给器械消毒。但不是所有

的微生物都能被沸水杀灭，L.B. 就曾染上败血症。或许如果我能用某个借口，在全科医生那里开到一些抗生素的话，这件事情便不会落到我头上了。我告诉她自己已经有了一张盘尼西林的处方。一切看起来既简单又有保障——不管怎样，有 L.B. 在我的前面。她不也好好地过来了吗。P.-R. 女士一次收取 400 法郎*。L.B. 建议我提前付给她。在那个时候，一个地址、一些钱，这些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需要的东西了。

（这个如今看来轮流看护过我的第一位女性，我只能用姓名缩写来指代她，那些女摆渡者们，她们的智慧、善行和她们及时的建议，都使我——尽量安稳地——度过了这场考验。我想要在此记下她的姓氏、她有着象征意味的名字，由她逃离西班牙佛朗哥政权避难的双亲所取的名字。但驱使我这么做的缘由——L.B. 的真实存在，让我能够在所有人面前揭开她的面

* 大约相当于 1999 年的 6000 法郎。

纱——也正是我无法如此做的原因。我没有权利，通过运用不对等的权力，在一本书所构成的公共空间里，将 L.B. 这样一位真实的、仍在世的——按照我从电话簿上得到的信息——女性曝光出来。她完全可以反驳，说她“并没有让我这样做”。

上个周日，从诺曼底的海岸回来后，我绕道去了鲁昂。我在大时钟街散步，一直走到大教堂，在新修建的宫殿广场的咖啡厅露台坐下。由于这本我正在写的书，我不停回忆着六十年代的样子，然而，粉刷过的、多彩的市中心没能使我有任何感触。只有经过抽象化的努力，那些岁月才变得触手可及。它迫使我剥离城市的色彩，将墙壁恢复为深沉、朴素的色调，将步行街还原成曾经汽车驶过的场景。

我的目光扫过路上的行人。就像在风景画片中一样，画面中隐藏着有待被发现的各色人物，在他们中间，或许也有 1963 年的学生们。我在写作中将他们

看得分明，此刻却对他们完全视而不见。我的邻座是一位棕色头发的漂亮女孩，她有着被太阳晒后的哑光肤色，嘴巴又小又厚，她让我想起了 L.B.。我很乐意将她想象成 L.B. 的女儿。)

我出发去往中央高原与 P. 会合，不确定他是否想要见到我，花掉一部分用来堕胎的钱显然也并不明智。但我从未参与过冬季运动，在拜访第十七区卡尔蒂内街的死胡同前，我需要一段宽限期。

我看着《米其林指南》中蒙多尔的地图，读到了诸如麦纳迪尔、西多尼-阿波利奈尔、蒙罗泽尔、夏佐特船长巷以及万神庙广场等街道名。我发现多尔多涅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城中有座温泉疗养院。我就像从未到过这里一般。

在我的日程本上，我写道：“我们在赌场跳舞”——“我们要去塔纳里酒馆”——“昨天晚上，

我们去了格朗日区。”可是，除了冬雪和午后我们歇脚的拥挤咖啡馆，我什么也没看见，点唱机上正放着《如果我有一把锤子，该是十分幸福》(*Si j'avais un marteau, ce serait bonheur*)。

对场景的回忆伴随着愤怒和泪水，而非话语。我无法确认，那时的 P. 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而我又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对于这场源于我自身欲望、取决于我自己利益而做出的堕胎决定，或许是为了迫使他承认这是一种牺牲，甚至是一种“爱的证明”。

法学院的安尼克和冈特兰并不知道我怀孕了，也不知道我要堕胎。P. 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认为他们的想法过于资产阶级式的墨守成规——他们有经济来源，并且不睡在一起。他显得十分急迫，尤其不愿因为这件事破坏节日的气氛。每次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时，他都会变得阴郁。在波尔多时他就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甚至怀疑他压根儿没去想怎么解决。

这对情侣十分富有，他们住在一家古老而别致的旅馆里，而 P. 则和我挤着一间小小的寄宿房。我们很少做爱，每次很快便结束了，完全没利用到我现在的优势——毕竟恶行已经犯下了——这无异于失业者没能利用失去工作带给他的时间和自由，或是病人膏肓的人不趁机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

淡淡调侃的语气是群体交流的规则，偶尔会被一些小事打破，但很快恢复平静，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他们全都做完了功课，交了作业，无忧无虑的放纵是他们作为学生得到的报偿。他们想要开玩笑，跳舞，看《亡命的老舅们》(*Les Tontons filngueurs*)。我这学期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堕胎。我努力试图跟上他们普遍的好心情，但自认为并没有成功。我只是扮演了一个跟随者的角色。

我只对体力活动感兴趣，希望通过某次剧烈运动或是一次摔倒将“它”弄掉，使我无需再去第十七区拜访那位女士。因为我没有租装备，安尼克把她的滑雪板和靴子借给了我，我摔得毫无保留，每次都希望通过这种震荡使自己得到解脱。某天，P. 和安尼克都不愿意再往高处去，我只在冈特兰的陪伴下，穿着敞口的仿皮革靴子，爬到了瑞梅尔山的顶峰。雪厚厚地积在我的靴口。我向前走去，双眼紧盯着斜坡，被雪面细碎的闪光眩花了眼睛，越来越难将靴子从雪的粉末中挣脱出来。我只剩下一个愿望，那就是弄掉这个胚胎。我确信必须到达顶峰，在我的力量到达极限的时候，才能摆脱它。为了将它杀死在我的体内，我已经筋疲力尽。

每当我想起在蒙多尔的那个星期，都会看到那片刺目的阳光与白雪，以及在那背后的、来年的一片晦暗。或许，原始的记忆让我们用光和影、日与夜的基

本形式，去回望所有逝去的人生。

（在写作时，总是经常出现需要证明的地方：除了日记和关于这段时间的日程本之外，我似乎对那些感觉和思想没有任何的确定性，因为它的非物质性，它的一闪而过，以及它的转瞬即逝。

那些外在于我的存在和物，只有与它们相关联的感觉的记忆——如瑞梅尔山的雪、让·T.那双外凸的眼睛，以及“微笑修女”的歌——才能给我带来现实的证明。唯一真正的记忆是物质的。）

12月31日，我搭乘某个家庭的车离开了蒙多尔，他们同意带我一起回巴黎。我并未参与他们的谈话。在某一刻，其中一个女人讲到某个住在阁楼的女孩流产的事情，“她整夜都在呻吟”。对于这段旅途，我只记得阴雨的天气和这句话。它属于那种时而令人

恐惧、时而让人欣慰且或多或少隐匿了姓名的话语，这些话语将我带入考验之中，如同护身符一般陪伴着我，直到同样的事情应验在我的身上。

（对我而言，需要讲述这个故事，才能重新回到1964年1月的第十七区，就像我在十五岁时，通过同样的方式去往未来：去一个遥远的国家旅行，做爱。我还不知道自己会写下怎样的句子。我也不知道写作会带来什么。我只想将这一刻延迟，永久地停留在这悬置的等待之中。或许是害怕写作将会使它消解，就如同性欲在高潮那一刻旋即消失一般。）

1月8日的星期三*，我前往巴黎去和那位女士见

* 标记日期之于我的必要性，在于它将与事件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来说——1963年11月22日——，对所有人来说，这个日期代表了生与死的界限。

面，并与她商定了具体的细节、日期以及费用。为了节省行程的花费，我在圣凯瑟琳海岸的南边搭便车。相比于我如今的处境，多一点少一点危险都是无关紧要的。天上下起了雨夹雪。一辆大车停了下来，司机告诉我，这是辆“捷豹”。他戴着手套，手撑在方向盘上，一言不发。他在纳伊将我放下，让我去乘地铁。抵达第十七区时，天色已经昏暗。路牌上是“卡尔蒂内巷”的字样，而不是什么“卡尔蒂内死胡同”，这似乎是个好预兆，让我松了一口气。我走到那条街上一座破旧的建筑前，P.-R. 女士就住在三楼。

成千上万的女孩们在我之前曾迈上过这些台阶，敲开那扇门，门的后面是一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女人，而她们却要将自己的隐私器官和小腹交给她。而这个女人，这个唯一能够让痛苦消失的人，为我打开了大门。她裹着围裙，脚上踩着圆点拖鞋，手里拿着块抹布。“您需要什么吗，小姐？”

P.-R. 女士矮矮胖胖的，她戴着一副眼镜，头上梳着灰色的发髻，身上的衣服显得颜色暗沉，看起来像是乡下那些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匆匆地让我进来，走进一间狭窄、黑暗的厨房，然后又进入一间稍大些的卧室，卧室的家具已经过时，这是公寓仅有的两个房间。她问我上次月经的时间。三个月前。她说现在正是做掉它的好时候。她让我把外衣解开，双手隔着裙子摸了摸我的腹部，满意地惊叹：“您的肚子很小！”当我告诉她，自己在雪地上尝试过剧烈运动时，她耸了耸肩，说道：“您以为呢，它可是很强壮的！”她的声音很愉快，仿佛在谈论一头狡黠的小兽。

我站在床边，面对着这个脸色灰白、语速飞快且动作利索的女人。我就要将自己腹中的东西托付给她了，一切将在这里完成。

她让我下周三再来，只有那天她才能从所工作的诊所里把窥镜带回来。她会放一个探针进去，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既不需要肥皂水，也不用漂白剂。她跟我确认了费用，400 法郎现金。她坚定地告诉我，一切都在掌握中。她并不亲切——没有用“你”来称呼我，并且十分谨慎——，也不多问任何问题，她只管最基本的：最后一次月经的时间、费用、所用到的技术。这种纯粹的物质性给人一种怪异而又令人心安的感觉，它既不属于情感，也不属于道德。根据经验，P-R 女士当然知道，将话语限制在实施细节，能够节省因哭泣和倾诉而浪费的时间，也能避免对方临时改变主意。

后来，当我回忆她快速眨动的眼睛、时而咬动的下嘴唇，想到那些在暗处窥伺着她的某种东西，我想，她可能也曾害怕过。可是，就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堕胎一样，什么都无法阻止她来做这件事。当然，这是

出于金钱的考虑，但或许也是由于某种能够帮助到女人的感觉。更甚者，对整天忙于清空病人和产妇便盆的她而言，在这个卡尔蒂内巷的两居室内，她终于拥有了和那些几乎从不同她问好的医生们一样的权力，这让她得到了某种隐密的满足感。因此，她需要收取高昂的费用，为了她所冒的风险，为了这份永远不会被承认的技术，也为了人们事后想到她时感到的羞耻。

在第一次去过卡尔蒂内巷之后，我便开始服用青霉素，心中除了恐惧再也想不到其他。我看到了 P-R 女士的厨房和卧室，不愿去想象她会对我做什么。在学生餐厅，我跟女孩们说自己要去除后背上的一颗大痣，并为此感到十分害怕。她们看上去十分惊讶。这是台小手术，而我竟表现得如此痛苦。承认害怕让我松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我自己都相信等待着我的不是厨房和年老的护士，而是干净的手术室和戴着橡胶手套的外科医生。

(现在的我已经无法再体会那时的感觉。只有在某个偶然的瞬间，在超市或邮局排队的人群里，当我看到那些六十多岁、外表粗糙且令人反感的女人时，总会想象她们将陌生的器械伸进我的性器官中搜寻的样子，才会短暂地接近自己在那个星期所经历的一切。)

1月15日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我乘火车去了巴黎。在到达第十七区时，离与P-R.女士约定的会面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卡尔蒂内巷周围的街道上闲逛。天气温和而潮湿，我走进一座教堂，圣嘉禄鲍荣茂主教座堂，在那里坐了很久，祈求待会儿不要太过痛苦。时间还没到。我走进卡尔蒂内巷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边喝茶，边等着。邻桌坐了几个学

生，他们是这家咖啡馆唯一的顾客，正在玩421骰子游戏，老板也和他们一起玩笑着。我不停地看表。离开时，我下楼去了洗手间，这是我从小被教导形成的习惯，在重要的事情来临之前采取预防措施。我盯着洗手池上方镜子里的自己，或多或少地想着“轮到我了”，以及“我会受不了的”。

P-R.女士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我看到煤气灶上正烧着一锅开水，器械应该就在那里。她让我进到卧室，似乎急于开始。床边放了张桌子，上面覆盖了一条白色的毛巾。我脱掉紧身衣，褪下内裤，但我留下了那条黑裙子，因为它下面是喇叭形的。当我脱衣服的时候，她问我：“当你第一次的时候，流过很多血吗？”她让我将上半身放到床上，把头垫在枕头上，腰部和腿部弯曲，抬起来放在桌子上。她在操作时不停地说着话，再次声明她只是插入了探针，仅此而已。她向我讲述了一个案例，某位母亲在一周前被

发现死亡，有人给死者注射了漂白水，还把她扔在餐桌上。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P-R. 女士语气激昂，对于这种缺乏职业良知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怒。她说这些话，是想让我安心。我倒是希望她没跟我说这些。后来我想，她是在寻找改善工作模式的方法。

她在床脚的桌子边坐了下来。

我看到挂了窗帘的窗户，以及街道对面那排的窗户，还有我双腿之间 P-R. 女士那灰白的脑袋。我从未想过自己某天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或许我还想到，与此同时，学校里那些女孩子们正在埋头看书，我的母亲正一边拎着熨斗一边哼歌，而 P. 正走在波尔多的某条街道上。可人们不需要去想那么多事情，事情也会继续在他们的身边依次发生，或许是因为看到身边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像曾经一样继续，我才不断地问着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的记忆回到了那间卧室。它超越了分析的范畴，而我只能使自己沉浸其中。似乎，这个在我双腿之间忙碌的女人，这个用窥镜的女人，让我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在那一刻，我杀死了存在于我身上的母亲。

多年来，那间卧室和窗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仿佛我仍旧躺在那张床上。某位年轻高管买下了整层公寓，它或许已经变成了其中一间通透明亮、配备了宜家家具的房间。然而，我确信，没有什么能够抹去它所保留的、那些女孩和女人们在这里接受探针刺进身体的记忆。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她说：“别喊了，我的孩子。”她说：“您得让我把它弄完。”或许她还说了些别的，但这些话于我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我必须忍受，要坚持到底。这些话，我在后来有关秘密

堕胎的妇女的报道中又重新见到，仿佛在那个时刻，只能用这些话来表达某种不得不如此的必要性，以及某种悲悯的同情。

探针不知在里面搅了多久，我止不住哭泣，已经感觉不到痛苦，只有腹部那种沉重的感觉挥之不去。她说，一切都结束了，嘱咐我之后不要碰任何东西。她给我垫了一块厚厚的棉布，防止破了的羊水流出来。我可以慢慢走着去洗手间。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这种状况会消失，否则就需要给她打电话。我们一起在厨房喝咖啡，这对她而言也是一次成功的手术。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给她的钱。

她担心我自己怎么回家。她提议开车送我去卡尔蒂内桥车站，我可以从那儿坐火车直接去圣拉扎尔。我想一个人走，也不希望再见到她。但我不想冒犯和拒绝她，她毕竟对我表现出一种关心，虽然很大可能

是她怕我会昏倒在她家门口，被别人看见。她迅速套上大衣，但并没有换掉脚上的拖鞋。

走出大楼，瞬间，一切变得极不真实。我们并排着走在马路中央，朝着卡尔蒂内巷的另一头走去，视线逐渐被一幢楼房的墙壁挡住，只留下一线光亮。这是一个慢放的场景，天色变得有些昏暗。在我童年和过往的人生中，没有任何东西曾指引我走近那里。我们从行人的身旁经过，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似乎看到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时，他们便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仿佛被世界遗弃，除了这个穿着黑色大衣、像母亲一样陪在我身边的老妇人。离开她的洞穴，来到街道的灯光下，看着她暗沉的皮肤，我感到一阵厌恶。这个刚刚拯救了我的女人此时看起来像个巫婆，或是年老的鸩母。

她给了我一张车票，陪我一起在站台上等待着，直到开往圣拉扎尔的火车抵达。

（我有些不确定她是否穿着拖鞋。在我心里，总是把她和那些出门去街角杂货店买东西的妇女形象联系在一起，或许这正是因为对我而言，她属于那群底层人，是我那时正远离的那群人。）

1月16日和17日，我等待着宫缩的到来。我写信给P，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并写信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这周不回家，我要去看维也纳圆舞曲——鲁昂到处张贴着它的海报，让我可以用这个借口，而他们也可以从报纸上得到验证。

什么也没发生。我没感受到任何疼痛。17日，星期五的晚上，我从车站附近的邮局给P-R.女士打电话。她让我第二天早上去见她。在我的日记中，从1月1日起就什么都没写了，直到17日的星期五我才写下：“我还在等待。因为‘天使妈妈’没有做成，明天我还要回到她那里。”

18日的星期六，我早早地搭火车前往巴黎。天气极冷，一切都白茫茫的。车厢中，在我的身后，两个女孩不停地说着话，不时发出有规律的笑声。听到她们的声音，我仿佛没有了年龄。

在刺骨的寒冷中，P-R.女士惊呼着迎向我，让我快点进去。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正坐在厨房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贝雷帽。看到我，他似乎并不感到惊讶，也不觉得尴尬。我不记得他之后是离开了还是留在那里，但他一定说了些什么，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知道他是个意大利人。桌上放着水盆，水还在冒着热气，里面漂浮着一根细细的红管子。我知道，那是一枚新的探针，是她待会儿要放进我身体里的东西。我没有看到之前那个。它看上去就像一条蛇。水盆的旁边放着一把梳子。

（如果我必须用一幅画来表现我人生中的这个事

件，我会画一张靠墙的小桌子，上面覆着一层弗米加塑料纸，有只搪瓷盆被置于其上，里面漂浮着一枚红色的探针。稍微偏右一点，是一把梳子。名叫《“天使妈妈”工作室》，我想，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找不到这样的画作。）

和第一次一样，她将我领进了卧室。我不再对她要做的事情感到害怕，不再感到痛苦。当她从我身上取下探针，将它放进盆里时，她惊呼道：“您真是辛苦了！”这是助产士才会说的话。直到现在，我才想到，这一切都可以被比作一次分娩。她没有向我多收一次钱，但要求我事后将探针寄给她，因为这种型号不太好找。

在我从巴黎回程的车厢里，一个女人在无休止地锉着她的指甲。

P-R. 女士的作用就到此为止。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将这个消除不幸的程序启动。后续的一切不在她的酬劳之内。

（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加莱的科索沃难民正试图偷渡到英国。蛇头向他们索取了巨额佣金，有时甚至在他们过境之前便没了人影。但什么都阻挡不了这群科索沃人，更不用说那些从贫穷国家出来的移民了。他们没有其他的救赎之路。人们四处追捕蛇头，大家痛惜他们的存在，就像痛惜三十年前存在的那些为女人们堕胎的人。人们却不去质疑导致这一切产生的法律和世界秩序。移民走私者，就像从前那群将儿童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在他们之中，一定有一些比另外一些更合乎道德。

我很快从通讯录中撕下写有 P-R. 女士名字的那一页。我从未忘记过它。大约六七年后，在一名六年

级的学生身上我又见到了这个名字。那个学生有着金色的头发，沉默寡言，有些龅齿，对他的班级来说，他有些过大了，不论是个头还是年龄。我每次叫名字提问他，或是在作业本上看到他的名字时，都不能不想起关于那位卡尔蒂内巷女士的往事。对我来说，这个男孩只因与那位年老的“天使妈妈”之间的关联而存在。他或许是她的孙子。而那个我在 P.-R. 女士厨房里见过的男人，似乎是她的伴侣。那些年里，我曾在安纳西圣母广场的缝纫用品店见过他：一个口音很重的意大利人，头上总是顶着贝雷帽。到如今，我已经很难再分辨各种相似的记忆，无论是那个寒冷一月的某个周六的卡尔蒂内巷，还是七十年代站在矮小、敏捷、看不出年纪的女人旁边，卖给我滚边织带和植物象牙纽扣的那个男人。)

下了火车，我打电话给 N. 医生，告诉他自己做不了针刺。或许我是希望他会像上个月一样，让我

去他的诊所，接续 P.-R. 女士没做的事情。他长久地沉默着，随后建议我用一种名叫玛索吉内斯特里 (Masogynestril) 的药*。从他的声音中我明白了，自己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我不该再给他打电话。

(那个时候的我无法想象——不像现在——，当听到电话那头的女孩子宫里扎着探针走来走去了三天时，办公室里的医生是如何忽然之间冒冷汗的。他进退两难。如果同意她，那么根据法律，他必须将它取出来，并让她继续她不愿意的妊娠。而如果他拒绝了，她便会面临死亡的危险。他没有好的选择，他也没有人可以诉说。所以，只能是玛索吉内斯特里了。)

我走入最近的位于大都会对面的药房，去买 N. 医生交代的药。接待我的是个女人，她问我：“您有处方吗？没有处方的话，我不能给您开药。”我站

* 我不确定那种用于子宫的止痛药的名字，它如今已经不再销售。

在药房中央。柜台后面，两三名穿着白大褂的药剂师正打量着我。没有处方证实了我的罪恶。他们仿佛透过我的衣服，看到了我身体里的探针。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绝望的时刻之一。

（您有处方吗？需要处方才行！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每当我看到药剂师听到回答“没有”便再也不会置一词时，我总感到自己被痛苦压垮。

在写下这些时，我有时不得不拼命抵抗将愤怒和痛苦抒情化的倾向。我不希望在这个文本中呈现出那时在我生活中未曾出现或极少出现过的东西，譬如喊叫与哭泣。只是为了尽可能地重现那种平静地靠近不幸的感觉，例如药剂师的提问，以及浸泡在水中的探针、水盆旁的梳子等。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画面，当我再次听到那些话语时，我感受到的剧烈震动与我当时的感觉完全无关，它只是一种写作的情感。我的意

思是：它产生了写作，并验证了其真实性。）

周末的时候，大学城里只剩下几名外国学生和几个父母家住得比较远的女孩。隔壁的学生餐厅已经关门。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的需求。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恐惧，有的只是一种平静，一种除了等待之外别无他法的平静。

我什么都读不进去，也听不进唱片。我拿出一张纸，画下了从堕胎的女人家中出来时所见到的卡尔蒂内巷的样子，那些彼此靠近的高墙，还有深处的一丝缝隙。那是我成年后唯一一次想要画画。

星期天的下午，我走在圣艾尼昂山阳光明媚而寒冷的街道上。我已经感觉不到探针的存在。它仿佛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个仅仅限制了我走路速度的盟友。

1月19日的日记上写着：“还有些细微的疼痛。我想知道，这个胚胎还需要多久才能死亡并被排出体外。号手正演奏《马赛曲》，楼上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这一切就是生活。”

（所以这并非是不幸。真正的原因是一种必然性，使我需要再次想象自己在那个房间、那个星期天，才能在八年后写下我的第一本书：《空衣橱》。在坚持的欲望中，在这个星期天，在这个房间里，是我二十年前所经历的人生。）

星期一早上，我已经与这根探针共同生活了五天。中午时分，我搭乘火车前往Y市，这是一次短暂的回家，我有些害怕自己下周六的状态无法支撑我去见父母。或许，我应当像往常一样，掷一枚硬币来决定自己是否有时间来冒这个风险。气温短暂回升，母亲已经把卧室的窗户都打开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

的内裤，它已经被浸透，血和水顺着探针流了下来，探针已经逐渐露出来。我看到街区那些低矮的小房子和花园，和我童年时代同样的风景。

（在这个画面前，还有另一幅画面，那是在九年前。枕头中间大片淡红色的印记，是血与体液的混合，那是一只死去的母猫留下的。那时我还在学校，当我回家时，它已经被埋了起来，在四月的一个下午，肚子里几只断气的小猫随着它一起被掩埋。）

我乘坐四点二十分的火车回到了鲁昂。旅程只持续了四十分钟。像往常一样，我准备了雀巢咖啡、炼乳，还有几包饼干。

那天晚上，法鲁士的电影俱乐部放映了《战舰波将金号》（*Le Cuirassé Potemkine*）。我和O.一起过去。起初，我并没注意到身体的疼痛，它仿佛不时挤压着

我的腹部。每一次宫缩时，我都盯着银幕，试图屏住呼吸。之后，间隔越来越短，我的注意力已经无法再集中于电影上。钩子上挂着一块巨大的肉，聚集的虫子在上面蠕动着，这是银幕上出现的画面，也是我对这部电影最后的记忆。我起身跑回了大学城。我躺了下来，用手死死抠住床头板，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我吐了出来。后来，O.回来了，电影已经结束了。她坐在我的旁边，不知该做些什么，只是建议我像无痛分娩的女人们被要求的那样，像小狗一样呼吸。我只能疼痛来袭的间隙趁机喘一下气，痛苦仿佛永远不会停止。时间已经过了午夜。O.回去睡觉了，她告诉我，如果我需要的话就去叫她。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我有一股强烈的想要排便的冲动。我穿过走廊，跑进洗手间，蹲在马桶上，面对着大门。我看到了大腿之间的瓷砖。我使出全部的力气。它就像一枚手榴

弹一样被射出来，溅起一片水花，甚至溅到了门边。我看到一个裸体的小东西悬挂在我的性器官下面，由一根淡红色的线连接着。我从没想到，自己的身体里会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得不一直带着它，走回到我的房间。我用一只手托着它——它有一种怪异的重量感，将它夹在大腿之间，再穿过走廊。我像一头野兽。

O.的门半开着，里面有光透出来，我轻声叫她：“结束了。”

我们两个回到我的房间，我坐在床上，胚胎在我的腿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O.说，需要将脐带剪断。她拿起剪刀，我们不知该从哪里下手，但她直接剪了下去。我们看着那具极小的身体，它有着大大的脑袋，透明的眼皮底下，露出眼睛上两个蓝色的斑点。它看起来像个印度娃娃。我们看到了

它的性器官。他似乎已经长出了一点阴茎。就这样，我本来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东西。O. 坐在凳子上，她哭了起来。我们安静地哭泣。这是一幅没有名字的画，生与死同时存在。这是一幕献祭的场景。

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个胚胎。O. 去她房间找了个空的饼干袋，我把它轻轻地塞了进去。我提着袋子走到洗手间。里面好像装了一块石头。我把袋子翻开，倒进马桶里。我拉下了冲水的绳子。

在日本，流产的胎儿被称为“mizuko”，即水之子。

夜晚的一切默默发生着。在那个时刻，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出于她的信仰和她的资产阶级准则，O. 并没有做好割断一个三个月胎儿的脐带的准备。现在的她在

回忆起这段插曲时，或许会将它视作一种难以解释的混乱，她人生中的一个反常。或许她也会谴责人工流产。但那时陪在我身边的人正是她，也只有她，我还记得她不情愿地哭泣的小脸。在那个夜晚，在 17 号房间，在女生宿舍，是她暂时扮演了助产士的角色。

我正在失血。起初我没有注意到，还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血从剪断的脐带中汩汩地往外冒。我横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O. 给我递过来一些毛巾，但它们也很快被浸透。我不愿意和医生打交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他们，我自己也应付得挺好。我想要从床上起来，却感到一阵眩晕，我以为自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我大声地告诉 O.，说我现在就需要医生。她下楼去敲门房的大门，他却没有回应。随后，我听到一些声音。我确信自己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血。

随着值班医生的进场，夜晚的第二幕开始了。从

纯粹的生与死的体验，变成了一场展览和评判。

他坐在我的床上，捏住我的下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怎么能这么做？回答我！”他用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我恳求他不要让我死掉。“看着我！向我发誓你不会再这么做了！永远都不能！”由于他那双疯狂的眼睛，我甚至以为，若自己不发誓，他便会任由我死去。他拿出开药方的本子，说：“你得去主宫医院。”我说我宁愿去诊所。他坚定地重复：“去主宫医院。”他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唯一该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他要求我付给他这次出诊的费用。我没办法起来，他拉开了我书桌的抽屉，从钱包里取出了钱。

（我刚刚在文档中找到了关于这个场景的描述，是我在几个月前写下的。我意识到，自己用了几个相同的表述，比如“他会让我去死，他有这个能力”，

诸如此类。每当我想到自己在厕所堕胎的情景，总会想到类似炮弹引爆、手榴弹爆炸，以及木桶塞子崩开的比喻。这种无法用不同词句来进行描述的无力感，这种与过去的真实性与排他性的画面之间某种确定的连结，似乎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如此真实地经历了这个事件。）

一副担架将我从房间里抬了出来。一切都很模糊，我没戴眼镜。前半夜的抗生素和镇静剂对我都没什么用，我最终还是被送到了医院。我认为在大出血之前，自己一直都做得很好。我思考着问题出在哪里，或许是因为不该剪断那条脐带。事情于是超出了我的掌控。

（我有种感觉，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它的走向也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的决心、我的努力，所有这些秘密的工作，甚至是私底下的筹谋，虽然没人会怀疑

它出自我的笔下，但也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我将不再对我的文字拥有任何权利，它将完全敞开自身，就像被暴露在主宫医院的我的身体。)

我被安置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厅，在电梯对面一张带轮子的床上。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来将我推走。之后来了一个肚子极大的女孩，陪同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应该是她的母亲。她说她就要生了。护士训斥了她，说她完全没到分娩的时间。女孩想要留下来，她们于是吵了起来，最终她和陪同的女人一起离开。护士耸了耸肩：“就是那个女人，她已经让我们忙活两个星期了！”我才知道，那个女孩大约二十岁，没有丈夫。她留下了孩子，但情况却并不比我的更好。堕胎的女孩和鲁昂贫民街区成为母亲的女孩一样倒霉。或许，人们对她的蔑视更甚于对我。

手术室里，我一丝不挂，双腿被抬起，绑在手术

台的搁脚架上，强光打在我的身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手术，我的腹中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取出来的了。我恳求年轻的外科医生，希望他告诉我要对我做什么。他站在我张开的双腿前，大声喊道：“我不是什么水管工！”这是我陷入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不是什么水管工！”这句话，就像勾勒了这个事件的所有话语一样，稀松平常，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大声讲出来，却总是在我的心中爆裂。无论是一遍遍的重复，抑或是社会-政治学的阐释，都无法减轻它突如其来的暴力。霎那间，我仿佛看到一个戴着橡胶手套、穿着白大褂的男子对我处刑，口中喊着，“我不是什么水管工！”这句话或许是受费尔南多·雷诺一则喜剧的启发而来，他的短剧在当时风靡法国，这句话仿佛在我的身上将世界撕裂成不同的阶级，像一根挥舞的棍子，将医生与工人和堕胎的女性分开，将统治的人与被统治的人分开。)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最后我听到进来了一个女人，她大叫着让我闭嘴。我问她，医生是不是摘除了我的卵巢。她粗暴地向我保证：我只是被刮了宫。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身上穿着医院的罩衫。我听到婴儿的哭声。我的肚子像一只松弛的面盆。

我知道，一夜之间我失去了自己从青春期起便拥有的身体，失去了鲜活而隐秘的性器，它曾吸纳男性的性器官，却丝毫没有改变自身——甚至变得更加鲜活、更加隐秘。我现在有了一个被展示的、撕裂的性器官，一个被刮过的、对外开放的子宫。一个像我母亲那样的身体。

我看着挂在床脚的那张纸，上面写着：“妊娠子宫”。我第一次看到“妊娠”(gravide)这个词，我

不喜欢它。它让我想到一个拉丁语里的词汇——*gravidus*，沉重——我明白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我已经不再怀孕了。所以，是他们不愿意说出我所经历的事情。

中午，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块煮过的肉片，底下垫着一片蜷曲的卷心菜，菜叶上面的筋和叶脉交错可见，铺满了整个盘子。我无法碰它。仿佛是他们想让我吃掉自己的胎盘。

走廊里传来一阵骚动，像是从餐车那边发出来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女人大声喊道，“给喂奶的 X 或 Y 夫人一罐奶油”，仿佛在宣示一种特权。

昨天夜里给我做手术的实习医生经过。他待在房间的角落里，看起来有些不安。我猜他是因为在手术室对我的粗暴态度而觉得羞耻。我也替他感到不安。

但是我猜错了，他之所以感到羞耻，只是因为他——由于对我的一无所知——用对待纺织女工或“不二价”超市女售货员的态度，对待了一位文学院的女大学生，跟我那天晚上想的一样。

所有的灯都已熄灭了，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守夜的人，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来到我的房间，悄悄走到我的床头。在她半明半暗的身影中，我感受到她的仁慈。她有些责备地对我低声道：“昨天晚上，您为什么不告诉医生，说您是和他一样的人？”我犹豫了几秒，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和医生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在刮宫后才知道我是一名大学生，或许是从我的学生医保卡上看出来的。她向我模仿着实习医生的惊讶与愤怒，“但是不管怎样，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好像连她也对我的态度感到愤慨。我那时一定觉得她说得对，是因为我的失误，他的态度才那么粗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

离开的时候，她坚定地对这次堕胎做了总结：

“您现在这样就好多了！”这是我在主宫医院听到的唯一一句安慰的话，它或许不是因为某种女性间的默契，而是源于“小人物”对“高位者”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接受。

（如果我知道这位在1964年1月20日至21日夜间驻院的实习医生的名字，或是能够想起来什么，我现在一定忍不住写在这里。但这似乎是一种无用而不公平的复仇，因为他的行为只是诸多社会惯常行为中的一个。）

我的乳房开始肿胀和疼痛。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奶水上来了。我从未想到，原来我的身体竟然可以产出乳汁，以哺育这个三月大死去的胚胎。在某种缺席的场景里，自然仍旧机械地进行着它的工作。人们用一块布条将我的胸缠起来。每一圈都让我的乳房越来越平，仿佛要让它们陷入身体里。我以为它们再也

无法凸出来了。一位女护理员在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罐汤剂，“喝了这些，您的胸就不会痛了！”

对于一起来看望我的让·T.、L.B. 以及 J.B.，我向它们讲述了大出血和在主宫医院惩罚式的治疗。讲述时带着幽默的语调，他们听得很开心——那些我在后来不断回忆的细节一个都没有谈。L.B. 和我兴高采烈地对我们俩堕胎的情况做了比较。J.B. 说，街角杂货店的人告诉他，说没必要去巴黎堕胎，街道附近就有一个女人做这事，她只收 300 法郎。我们开玩笑，说我原本还能省 100 法郎。我们现在可以嘲笑那些烦恼和恐惧，嘲笑所有没能阻止我们违反法律的事情。

我不记得自己在主宫医院的五天里曾读过任何东西。收音机是被禁止的。三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我不再等待着什么。我仍旧躺着，透过窗户，我看到医院另一侧楼的屋顶。

刚出生的婴儿断断续续地哭着。我的房间里没有婴儿床，但我也生了个小东西。我感觉自己与隔壁房间的女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某种缺席，我甚至比她们知道得更多。在大学城的厕所，我同时分娩了生命与死亡。第一次，我感到自己被卷进女性的链条之中，在这根链条上，有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那是些灰色的冬日。我在世界中央的光中漂浮。

1 月 25 日星期六，我离开了主宫医院。L.B. 和 J.B. 负责办各种手续，并开车送我去车站。我在隔壁邮局给 N. 医生打去电话，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他建议我继续服用盘尼西林——医院的人并没有给我任何药物。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假装得了流感，迅速回到床上睡觉。我让他们请 V. 医生过来，他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他已经从 N. 医生那里提前知道了我堕胎的消息，因而听诊的时候格外守口如瓶，并给我开了盘

尼西林。

待母亲离开，V. 医生便激动地低声询问，想知道是谁给我做的手术。他挤出一丝笑容，“您为什么要去巴黎呢？您家街道这边便有一个‘妈妈’……[我不认识他说的那个名字]，她做得特别好！”现在，当我不再需要的时候，却到处都是“天使妈妈”了。但我着实没想到，这位投票给右派、在礼拜日弥撒时坐第一排的 V. 医生，却只能在事后给我一个我所需要的地址。他坐在我的床上，对着一个“出身低微”的好学生，一个可能会进入他的世界的人，像往常一样，轻而易举地表现出一种共谋的默契。

出院后，在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日子里，我唯一记得的便是自己半躺在床上，窗户是开着的，我读着“10/18”丛书里的热拉尔·德·奈瓦尔的《诗集》。我看着自己在阳光下穿着黑色紧身裤的双腿，那是属

于另一个女人的双腿。

我回到了鲁昂。时间到了寒冷而阳光明媚的二月。我似乎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世界。行人们的面孔、汽车、大学餐厅桌子上的托盘……所有的一切，对我而言有着溢出的意义。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溢出，我却无法抓住其中的任何一种。一边是充满无数意义的生命与事物，另一边则是言语、词汇那些毫无意义的存在。我陷入一种纯粹意识的兴奋之中，它不仅超越了语言，连夜晚也无法使它中断。我睡得很浅，确信自己仍旧清醒着。在我面前，漂浮着一个白色的物体，仿佛一条尸身被抛入虚空的小狗，跟随在儒勒·凡尔纳小说里宇航员的身后。

我去图书馆继续我的论文，这篇论文自十二月中旬起就被抛在一边。我在阅读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仿佛在破译某种密码。我论文的主题，超现实主义中的

女性，在我看来是一个清晰的整体，但我无法将其分解为小的观点，无法在一个文本中持续表达那些以梦境的形式所感知到的东西：它没有轮廓，但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甚至是比埋头书本的学生，比在试图寻找文件编号的女孩身边徘徊的、那个胖乎乎的大学助理更加真实的存在。我沉醉在无法用词语表达的智慧之中。

我在自己的房间听巴赫的《圣约翰受难曲》。当福音传教士孤独的声音用德语诵读基督的受难时，我仿佛听到自己从十月到一月的苦难在陌生的语言中被娓娓道来。随后，合唱团的咏唱响起。*Wohin! Wohin!*^{*} 广阔的地平线徐徐展开，卡尔蒂内巷的厨房、探针和鲜血通通融入世界的苦难与永恒的死亡之中。我感觉自己得到了救赎。

^{*} 德语，意为“去往何方！去往何方！”——译注

我走在街道之间，怀抱着1月20日和21日夜晚的秘密，仿佛藏着一件圣物。我不知道自己是已经抵达噩梦的尽头，还是抵达了美的顶点。我体会到一种骄傲的情感。或许就像那些孤独的航海者、瘾君子 and 窃贼们一样，走到了其他人永远都不会想到要去的地方。或许正是这种骄傲的情感，才驱使我写下这个故事。

一天晚上，O.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坐在地下舞厅的角落里，看着人们跳舞，惊讶地看到其他人快乐的样子，还有Annie L.容光焕发的面孔，她穿着那年冬天流行的白色羊毛连衣裙，让我眼前一亮。我参加了一个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的仪式，我只是一个多余的客人。

一天下午，我跟着医学生杰拉德·H. 一同来到他位于花束街的房间。他脱下我的毛衣和胸罩，我看到自己小而下垂的乳房——两周之前，它们还充满乳汁。我本想和他聊一聊这件事，并和他谈论 P-R. 女士。我再没有了和这个男孩在一起的欲望。我们后来只吃了点他妈妈给他做的蛋糕。

另一天下午，我走进了马恩大道附近的某个圣帕特里斯教堂，并告诉了牧师我堕胎的事情。我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感到自己如今身处光明之中，但对他而言，我却已陷入了罪恶。在离开的时候，我知道对我来说，宗教的时代结束了。

后来，在三月份，我在图书馆再次见到了雅克·S.，那个在我第一次去看妇科医生时，陪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的学生。他问我论文写得怎样。我们走到大厅。他像往常一样，围着我说话。他打算

在五月份时交出一份关于克雷斯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论文，并对我刚开始动笔这件事感到十分惊讶。我拐着弯儿让他知道了我堕胎的事情。或许是出于阶级仇恨，又或是出于骄傲，想要向这位声称工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厂长儿子发出挑战。当理解了我的话中意思时，他一动不动，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仿佛被一副看不见的场景惊呆了，陷入某种迷恋之中，在我的记忆里，总是能够在男人身上找到这种迷恋。^{*}他迷茫地重复：“棒极了，我的老朋友，棒极了！”

我又去见了 N. 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后，他微笑着告诉我，说我“恢复得很好”，语气中充满了赞美

^{*} 我很快在约翰·艾文（John Irving）的小说《苹果酒屋的法则》中重新看到了它。他笔下的一个人物，目睹了女人们在残忍的秘密堕胎中死去，后来为她们在模范诊所进行干净利落的流产手术，或是抚育她们分娩后抛弃的孩子。这是个充满子宫与血液的梦境，而他在其中攫取并掌控着关于女性生死的权力。

和满意。在不经意间，他同样也激发我将所遭受的暴力转化为一种个人的胜利。为了避孕，他还给了我一个放在阴道底部的隔膜和两管杀精的凝胶。

我没有将探针寄还给 P-R 女士。我觉得按照付给她的价钱，自己完全可以留下它。某天，我开着父母的车将它扔进了路边的树林里。后来，我为这一举动感到后悔。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回到了人们所谓的正常世界，这个表述貌似模糊，但所有人都明白它的意思。它意味着，无论是看到一个闪闪发亮的洗手池，还是火车上一排旅客的头，都不会引发疑虑或痛苦。我开始了论文的写作。为了慢慢还掉堕胎的钱，在晚上的时候，我负责照看孩子们，并替一位心脏病科医生接听来电。我去电影院看了奥黛丽·赫本和

加里·格兰特主演的《谜中谜》(Charade)，还有让娜·莫罗和贝尔蒙多的《香蕉皮》(Peau de banane)，我已经不记得这些电影讲的是什么。我剪短了头发，把眼镜换成了隐形的。对我而言，在眼睛上调整隐形眼镜，就像调整阴道底部的隔膜一样，困难而充满风险。

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 P-R 女士。我从未停止过想她。不知不觉中，这个女人，或许贪婪而贫穷，却将我从母亲那里夺过来，抛入现实的世界。我应当将这本书献给她。

数年来，1月20日至21日的夜晚一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如今我才知道，经历过这种磨难和牺牲，自己才

会渴望拥有孩子。接受我身体里这种繁殖的暴力，轮到我加入这世代相传的链条。

我已经用语言写下了这种于我而言极致的人类体验，一种关于生死，关于时间、道德、禁忌与法律的体验，一种从身体的一端到另一端所经历的体验。

我消除了关于这件事唯一的负罪感：关于它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也关于我的无能为力。就像一份收到却又被浪费的礼物。因为除了我能为所经历的一切找到的所有社会的、心理的原因之外，有一件比任何事情都让我确定的事：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正是为了我可以讲述它。而我生命的真正目标或许仅在于此：让我的身体、我的感知、我的思想成为书写，成为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普遍性的东西，让我的存在可以完全消融在他人的头脑与生命中。

这天下午，我重新回到第十七区的卡尔蒂内巷。我带着一张巴黎地图，并事先规划好了行程。我想找回在去找 P.-R. 女士前曾待过的那家咖啡馆，还有我长久停留过的圣嘉禄鲍荣茂主教座堂。地图上只显示了一座名叫圣嘉禄德蒙索的教堂。我想，它们或许是同一个，只是换了名字。我在马勒塞布站下了车，一直走到托克维尔街。大约是下午四点，天气非常寒冷，阳光充足。卡尔蒂内巷的入口处放了一块崭新的路牌，在上面，旧的那个也被保留了下来。那是块黑色的旧牌子，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难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某个建筑物的一楼挂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与塞纳-瓦兹省流放者协

会”。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它。

我来到了 P.-R. 女士的住址。在门前停下来，门是关着的，有一个密码锁。我继续向前走，走到马路中间，远处墙间的缝隙中，有阳光投进来。我没有遇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车辆经过。我生出一种感觉，仿佛在模仿一个人物的动作，却没有体会到任何感觉。

走到卡尔蒂内巷的尽头，我向右边转，试图寻找那座教堂。也就是地图上的圣嘉禄德蒙索教堂，而不是鲍荣茂主教座堂。教堂里有一座圣丽塔（sainte Rita）的雕像，我想自己那天一定在雕像前点亮了一支蜡烛，因为人们说她是守护“绝望事业”的圣徒。我回到了托克维尔街，回想自己当时在等待时，是在哪家咖啡馆喝了茶。从外面看去，这些咖啡馆似乎都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但我确信一定能通过地下一层的洗手间辨别出来，我在前往 P.-R. 女士那里之前，曾下楼去过一次。

我走进布拉扎咖啡馆，点了一杯热巧克力，把要批改的试卷拿了出来，却一行也没读下去。我一直在想，自己一定要去洗手间看一下。一对年轻的情侣正靠在桌子上低头彼此亲吻着。我最终站起身，询问酒保洗手间的位置。他指了指大厅深处的门。门直接通向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个洗手池，上面挂了一面镜子，右边是第二扇门，就是洗手间的门了。这是一座土耳其式厕所。我不记得三十五年前咖啡馆的厕所是不是也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这并不是能够让我注意到的细节，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是这个样子：水泥地上开个洞，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脚踏板，方便人踩在上面并蹲下来。

在马勒塞布站的站台上，我告诉自己已经回到了卡尔蒂内巷，并相信会有一些事情将要发生。

1999 年 2 月至 10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事件/(法)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著;
甘露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ISBN 978-7-208-18682-8

I. ①事… II. ①安… ②甘… III. ①自传体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45817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e2 works

封面画作来自朱鑫意的“2020”系列作品

事件

[法]安妮·埃尔诺 著
甘 露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3.75
插 页 6
字 数 44,000
版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682-8/1·2127
定 价 36.00 元

L'Événement

Annie Ernaux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4

本书禁止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销售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埃尔诺作品集”

已出版

《一个男人的位置》

《一个女人的故事》

《一个女孩的记忆》

《年轻男人》

《占据》

《羞耻》

《简单的激情》

《写作是一把刀》

《相片之用》

《外面的生活》

《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看那些灯光，亲爱的》

《空衣橱》

《事件》

《迷失》

《外部日记》

《真正的归宿》

《被冻住的女人》

《一场对谈》